

目 录

- 国民党兵役部的设置和“役政”……………鹿钟麟遗稿 (1)
- 鹿钟麟将军的一生……………高继高 (17)
- 刘定五先生生平事略……………刘宁人 (100)
- 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建校经过……………陶布新 (108)
- 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办学概况……………巴靖远、侯彦之 (115)
-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建校始末……………张尔杰 (120)
- 绥远省乡村工作人员训练沿革……………程景华 (138)
- 伊盟“三·二六”事变始末……………邹焕宇、张中徽 (143)
- 乌审旗抗垦事件回忆……………奇世英 (152)
- 索伦惨案……………卓日格图 (156)
- 先父满泰生平事略……………满存生 (164)
- 我的同学和挚友——荣祥……………赵国鼎 (174)
- 周仓喇嘛的一生……………腊穆毕席 (181)
- 敖汉旗三喇嘛……………叶木苏荣 (189)
- 崔兴武小传……………韩玉臣 (196)
- 姜明远任热河游击支队司令的始末……………张向一 (199)
- 白凤翔轶事片断……………王绳武 (206)
- 布和克什格创立的开鲁蒙文学会……………达瓦敖斯尔 (209)
- 东蒙书局与其出版事业……………达瓦敖斯尔 (210)

国民党兵役部的设置和“役政”

鹿钟麟

“借人头”故事的搬演

人们都熟悉《三国演义》书中，曹操在和袁术一次作战中，因军粮不足，借仓官的人头，以安定军心，这样一个故事。这个“借人头”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在重庆曾师曹操的故技，又重新搬过一次。

时间大约是1944年秋冬之际(具体的日子记不清楚)，一天，蒋经国接到了一份密报，说是有一队新兵，住在重庆某地一所破房子里，无衣无食，厥状甚惨。……蒋经国看了这份报告后，立刻禀陈了蒋介石。蒋介石便偕蒋经国乘车驰赴该队新兵住处。进入这所破房子一看，果见有几十个叫化子似的新兵横七竖八地躺在狼籍的稻草上，个个面黄肌瘦，形同饿殍。蒋介石问他们：一天吃几顿饭？答是：吃两顿稀粥；问他们：为什么现在还穿着破烂的单衣？答是：还没有发给棉衣；问他们：害病的有医药没有？答是：没有。……蒋介石听罢大怒，立刻叫跟随的侍从打电话给兵役署，要署长程泽润前来！

这时，程泽润正在公馆里，大排酒宴，庆祝五十大寿。听说“委员长”现在某队新兵住地，唤他前去，便自知不妙（据说：有一位星相家曾为他算过命，说他交五十岁时，流年不利，当有大祸临头）。他硬着头皮，匆匆地赶到某队新兵住地。蒋介石看见程泽润，便咆哮如雷，连说：“看你办的这兵役！看你办的这兵役！”一边说，一边抡起手杖，向程泽润身上乱打，打后，又立即命侍从把程泽润送进监狱，后来便枪决了。

国民党统治下的兵役，从来就是一团糟的。到了抗日战争

后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趋反动和腐败，更糟到不堪言状的地步。

当初，国民政府虽然也颁发了一套“兵役法”，兵役机关也根据“兵役法”制定了各项征兵实施法令。但是国民党的这些法令，都成了残害人民的工具。

每一次征兵时，地主和豪绅们凭着他们的特殊势力，他们的子弟，总是可以设法脱避兵役的。必须服兵役的，乃是那些穷苦无告的劳动人民的子弟。国民党的那些贪官暴吏，在办理兵役时，对于劳动人民的敲诈勒索，对于壮丁新兵的摧残虐待，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自从国民党开始征兵以来，真不知有多少办理兵役的县、区、乡、保、甲人员，及兵役机关干部都脑满肠肥了！真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告的劳动人民，被敲诈勒索而倾家荡产了！真不知有多少壮丁新兵被虐待摧残而丧失了生命！更不知当时的蒋管区内，出现了多少“石壕吏”和“折臂翁”！

这些罪恶的责任者，是程泽润吗？不是的，它是整个国民党政权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如果说程泽润是该杀的，那么办兵役的张泽润、李泽润，个个都是该杀的。尤其是蒋介石，何尝不知道兵役的败坏？不能由一个兵役署长程泽润来负责。然而他却以怨办一个程泽润，来欺骗人民，推卸自己的罪责，这不正是曹操“借人头”的故技吗？

程泽润被关进监狱后，兵役署长一职，蒋介石要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张群从四川人中保荐一人继位。张群于是推荐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为兵役署署长。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自然又是有打算的。那就是：当时蒋介石的统治，主要是依靠四川省人力、物力的支持。可是几年来，由于蒋介石以种种阴谋手段，对四川人民进行压迫、剥削，同地方势力发生矛盾。这个时候，由于这些矛盾日趋尖锐化，在征兵上已经发生困难，因此蒋介石才想就四川籍中，找出一个人来，继任兵役署长，企图使四川的征兵工

作能顺利进行下去。他并不是因为程泽润把兵役办糟了，想另找出一位干员来，把兵役整顿一番。

不过，徐思平虽然是四川籍，但他是一个油嘴滑舌，并且攀附张群的人。在四川人的眼目中，不过也是一个出卖四川利益投靠国民党中央的“川奸”。所以徐思平的出任兵役署长，并未能使蒋介石达到他预期的目的。

蒋介石另作“良图”

自从1940年春，我便住在重庆的歌乐山。这个时候，蒋介石给我的官衔是“军事参议官。”这个“军事参议官”，对于军事是既不“参”也不“议”。使我有机会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并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自觉受益不少，这是我的收获。

到了1944年9月，一天，忽然接到冯玉祥先生自重庆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是蒋介石要召见。我当时很诧异：这位“委座”何以于百忙中，忽然念及山林。第二天进城，见到了冯先生，他告诉我：蒋介石的“召见”，是因为拟将兵役署改成兵役部，并拟要我出任兵役部部长。

当时，我便向冯先生说：“现在的兵役可不好办，咱们可担不起这副沉重的担子。蒋介石帐下有的是攀龙附凤之人，何必又要我们来做这个部长呢？”冯先生说：“是喽；兵役难办，才要找出我们来办！要是好办，自然会有人去办，那还要我们出来呢？”我说：“兵役的黑暗腐败，真是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人民反抗征兵的事，在四川各地，即时有所闻。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干好呢？干不好，最后还不是要我们做第二个程泽润！”冯先生听完笑了，要我去见见蒋介石再说。

我到了曾家岩“官邸”见到了蒋介石，他脸上浮现着笑容首先向我问好。我说：“托委员长的福，这几年住在歌乐山，平日

是读读书，写写字，种种菜，养养花，生活得很好！”他说：“不能总是过这种生活，要出来负一部份抗战建国的责任才行。冯先生和你说过了吗？我们打算把兵役署改升为兵役部，请你担任兵役部部长。”我说：“委员长的命令，我理当服从；不过，兵役是抗战建国的要政，我对于办兵役可是个外行。而且这几年又疏懒惯了，这个责任我实在担负不了。委员长还是另请贤能吧！”他说：“你可以担负。现在当务之急，一个是‘兵’，一个是‘粮’。这两件事办不好，抗战的前途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兵役办得很糟，征不上兵来，我们又怎样来抗战呢？”我说：“正因为兵役是当前的一项要政，关系着抗战前途，目前又有困难，才更需要一位干才来做呢！”他笑着说：“我看你就是一位干才。你在西北军，有练兵的经验，征兵上有困难，有冯先生可以替你宣传呀！”他说到这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蒋介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把兵役署改为兵役部，并且要我出来担任兵役部部长的原因。那就是：在当时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和四川人民以及四川地方势力矛盾日趋尖锐之下，张群所保荐的四川人徐思平任兵役署署长，并未能缓和这种矛盾。于是蒋介石才“别出心裁”，“另作良图”。构成这个“良图”的因素，乃是蒋介石首先觉得以冯先生为首的旧“西北军”和四川地方势力，并没有什么矛盾，而且还对某些有力人物有好感；其次他还看到冯先生在四川还有些号召力量。（当时冯先生常到四川各地演讲）另外是他也许认为冯先生和我与当时一些进步人士有些往来。……凡此种种，倘如在此时此际，把兵役署改为兵役部即由我来当部长，大可以缓冲各方面，岂不是个绝好的妙算？

我想到这里，没有再多说什么话，只是向蒋介石表示：我实在担当不了这个重任，请他重新“从长考虑”，“另简贤能”。接着便起立告辞请退。他说：“瑞伯兄，你不要再推辞，我这就下条子！”

从“官邸”退出后，几位故旧分析了蒋介石这个“良图”，余心清等同志曾指出：蒋介石在这个时候，要我出来做兵役部部长，实在是“包藏祸心”。这不仅是兵役工作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利用“西北军”的人，为他搜罗壮丁，补充他的军队，而且是在民怨沸腾之日，还要我们当箭垛子，替他受过。其结果：我们和各方面良好关系被破坏，我们在社会上的声誉受损失，从而也便残害了冯先生的政治生命！

几位故旧的谈话，赤裸裸地揭露出蒋介石的险恶面孔。我听了也深以为是。于是当日下午便回歌乐山了。

过了一两天，薛子良（薛笃弼——当时任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自重庆来歌乐山，衔有蒋介石之命，特来“劝驾”；并传达冯先生的话，要我再赴重庆一晤。

第二天，我到重庆会见冯先生，关于兵役部的事，他主张我接受下来。依照他的看法：现在的蒋介石，虽然是执行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但是在今年日寇为了要把从北平到广州和南宁的交通线打通，从四月中，就发动了新的进攻，先打进了河南，后又打进了湖南，现在又要打进广西。中国军队，一碰上敌人就败，这真是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蒋介石在这个时候，不免要挠头了，于是才“急了抱佛脚”，要我们出来当兵役部长，办理征兵，补充部队。我们平日是主张坚决抗战的，在这样紧急关头，有抗战的工作要我们来做，我们能袖手旁观吗？

听了冯先生这一段话，我一时无话可讲，停了一下，我说：“蒋介石要我们出来担任兵役部长，是否是利用我们并且要中伤我们呢？”他说：“自然是利用我们。但现在是大敌当前，为了抗战，我们才甘愿受一下利用呀！现在的兵役是一团糟，不好办，但是我们只要能有所改善，就容易表现出成绩来。对于我们，蒋介石还不会以第二个程泽润来对待吧？”

冯先生讲了一番话，最后还是要我答应出任兵役部部长。看

样子，他似乎和蒋介石已有“成议”，我于是说：“咱们可以去干一干，不过，必须和蒋介石讲一讲条件。他说：“有条件，你尽可以讲，这时候他是会件件依从的！”我说：“头一件，在人事上，不要干涉我们；二一件，给我们权，我们要怎么办便怎么办；三一件，给我们钱，我们好兴办一些事。”他说：“这三件大事，你就去向他讲吧，准行！”

冯先生和蒋介石通过电话后，蒋介石又邀我到“官邸”去。一见面，他就笑容可掬地说：“接到冯先生的电话，说瑞伯兄已答应担任兵役部部长，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他不等我开口，便又接着说：“你放手去做。在用人上，我不干涉你；兵役上应兴应革的事，都由你去办；需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我心想蒋介石这一回怎么这末痛快？不等我开口，三个条件，便全都答复了！我只好说：“那我就先试一试看。干不下去了的时候，再请委员长另派人。”他说：“你就去干吧！赶快组织兵役部，越快越好！”我说：“我回去把一些问题考虑、研究一下再来向委员长报告。”

现在回忆起来，在当时，蒋介石还是在抗日招牌掩护之下，利用了我。我之甘愿被其利用，固然有“倭寇深入，国家危急”的民族义愤，但自己却也有“闲极无聊，髀肉复生”，不堪寂寞之感，又碍于冯先生之命，所以才应允出任兵役部长。

周旋、应付、斗争

在兵役部的筹组过程中，我们先拟好了一份“兵役部编制”。这个编制，经过军委会法制委员会审定后，便着手人事上的配备。

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各个派系，都虎视眈眈，想伸手兵役部分得一杯羹。每天从早到晚，手持权要的“入行书”，光临求见的，真是络绎不绝，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在当时国民党内部互相排挤，互相利用那种勾心斗角复杂情况下，对于人事上的应付，

既不能一概“相应不理”，也不能一味迁就。如果一概摈之于千里之外，将来在工作上，则会到处掣肘；如果一味敷衍应酬，则在人事上成为一个“大杂烩”，也无法进行工作。因此，我们决定：①兵役部内各重要部门，各重要职务，配备上我们自己的干部或和我们有关系而又可为我们所用人；②兵役部内一些不甚重要的部门和职务，安插各方面所介绍来的人员；③对于“统”字号的人员（指“军统”、“中统”特务），无论由何人所介绍，则坚决拒绝其进入兵役部内。

在这样的原则之下，除了政务次长、主任秘书，征补司长、督察处及其他一些较重要的职务，分别由我的故旧和友好担任外，常务次长一职，即以原兵役署署长徐思平担任；役政司司长一职由原兵役署役政司司长翁国柱蝉联。这样一方面使兵役署和兵役部之间的兵役业务相衔接，也分别敷衍了张群和何应钦的面子（徐与张群有关系；翁与何应钦是贵州同乡）。国民兵司司长一职，安置了黄埔方面的肖作霖；副司长一职安置了和CC有关系的张梅谷，后来张还兼任特别党部的书记长。人事处处长，由军委会铨叙厅委派了黄埔的杨良担任。

另有军法执行监，乃是属于军法总监部系统而配属于兵役部的单位，我们无权直接作人事上的安排。当军法总监部组织兵役部军法处的时候，由政务次长秦德纯（原任军法总监部副总监）和军法总监何成濬商量，以徐业道为兵役部军法处处长。徐业道在1938年春，我任军法总监时，他在军法执行总监部任少将高级军法官，只知道他是一个善于钻营奔竞的官僚，八面玲珑，和人相处尚好办事。当时还不知道他此时已成为“军统”的骨干分子。

当我们正在考虑兵役部人事安排的时候，忽然接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的一封信，推荐一位姓连的，指定要兵役部督察处处长的位置。玩味信上的语气，大有非用不可之势。经过了解，

果然这位姓连的来历不凡，原来他是“军统”骨干分子，戴笠手下的大将。

本来，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各军政机关中，凡是属于督察、视察一类外勤性质的部门，大都是由“军统”、“中统”分别派特务控制，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成文法的规矩，很少例外。这些“军统”、“中统”特务，在各军政机关中的任务，就是防止所谓“异党”的打入，和监视各级主管人员的言行。蒋介石对于我所主持的兵役部，当然是不会放心的。但是他要我出任兵役部部长之时，又亲口说过“不干涉兵役部的人事”，自然不便再由他下条子，把什么“军统”、“中统”特务，硬性地派到兵役部来。这才转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出面，想以一封信，把这位“军统”大将，交给兵役部任用。

我们没有接受这位秘书长的“钧谕”，并且也装做不懂得各机关督察部门例须由“军统”“中统”派人担任的事例，便以“督察处正副处长，都已遴选有人”为辞，函复谢绝。

兵役部在十一月间组织成立了。“军统”未能开进来，蒋介石自然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又下条子给“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要他负对于兵役部的“检查”责任。徐恩曾没有再像吴铁城那样的权要写信，推荐“中统”大将，向兵役部要搜取什么位置，但是他有一次把兵役部主任秘书韩梅岑召去，询问兵役部的人事安排情况，还用一种威胁的语气想向兵役部安排人，韩返部报告后，经过考虑，我们还是“以兵役部各单位人员已编配齐全”为辞，婉言拒绝了。

“军统”、“中统”都没有在兵役部搜得位置，他们自然也不会“忘怀”兵役部。后来“军统”曾派叛徒袁晓轩来兵役部，经派人接见，据称要看看梁蔼然（梁当时在兵役部任部附），告以梁现不在部内，才把他应付走了。之后，更有军委办公厅，以密函一件送兵役部，说：“兵役部部附梁蔼然是共产党，请查办见

复”云云。这份公文收到后，即另外提存压下，到兵役部结束，便予以注销，以不了了之。

总起来说，当日兵役部，“军统”、“中统”都没有公然攫得地盘，但是这两只魔爪，偷偷地伸进来，布置上几个“暗探”，这是我们无法防止的。尤其是兵役部的人员，和其他机关一样是来自各方面，又接收了兵役署那个旧摊子，自是红、黄、兰、白、黑多色人物俱全。不过，我的故旧友好和进步力量，还是居于主导地位。当时除中共地下党员梁蔼然、王倬如、王冶秋、赖亚力等同志外，“小民革”（民主革命同盟）吴茂荪、师志真等，也进入了兵役部。吴任督察处副处长，师任秘书。这也是蒋介石不放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可救药的“疫症”

国民党政权之下的“役政”，有人把它写做“疫症”。这种比拟是很恰当的。当时的所谓役政，黑暗腐败，的确像是一种流行最广、最迅速的传染病，残害着广大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我到兵役部后，情绪有时酷似一位不高明的大夫，面对着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深感束手无策，但是大夫被请了来，既已临床，不能不开上一个药方，可是我既没有诊断出它的病源（国民党政权反人民的本质）所在，便根据一些病象，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地胡乱开了几位药，这自然是治不好病的！即使我在当时能认识到它的病源是什么，而它的死亡是早已注定了的。又谁能有起死回生的仙丹妙药呢？更可叹息的是，连那个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药方，在当时环境之下，也是无法照方抓药的！

回顾在兵役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虽然也制订了一些工作计划，提出了一些办法，对于役政要有些整顿和改革，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无补的！

以征兵来说：兵役部当时也曾经提出了“合理合法”、“如期

如数”的口号，并制定了“壮丁登记”、“抽签”等多种具体办法，还下了严厉执行的命令；但是实际办理征兵事宜，总还得依靠各地方行政机构。这一套地方行政机构，是黑暗腐败透顶的，无论什么样的好办法，一到这批县、区、乡、保、甲人员手中，也都会变了质，成为他们鱼肉人民的工具！

我们当时也曾意识到这一点，觉得在那种黑暗腐败政权之下，征一次兵，便是给那些县、区、乡、保、甲多一次鱼肉人民的机会。给人民造成一次骚扰和苦难，但是兵又不能不征。为了尽可能对人民减少一点骚扰和苦难，我们特地把过去一年两次征兵的旧制度，改为春季一次征召。这也不过是对人民的骚扰和苦难两次并作一次而已！

1945年的春季，一次征兵要开始了。这之前，我先到成都和地方当局邓锡侯及地方耆老熊克武、但懋辛诸先生等见了面，获得了他们的谅解和支持，又到成都公路沿线各地作了视察，告诫办理兵役人员，遵守法令，勤劳役政。当征召令下，征兵开始之后，据派往各地的督察官报告：依然是“闾阎骚然、鸡犬不宁”，贪污舞弊的事情，层出不穷。有的县虽然在形式上办理了“壮丁登记”，举行了“抽签”，但实际上“中签”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其子弟不但可以设法逃避兵役，他们还可以包庇别家壮丁。有的县，连形式上的“壮丁登记”和“抽签”也不举办，索性就是乱抓乱拉一阵，甚至把行路的旅客或是甲乡到乙乡的人，都拉来当壮丁。在紧急的时候，竟闹到路上行旅裹足，乡与乡之间断绝了往来。

区、乡、保、甲人员的“捉丁”，通常是夤夜破门或越墙而入，如捕捉强盗一样。将壮丁捕获后，使用绳索捆绑起来，禁闭在一所屋子里。之后，再由乡送区，由区送县；再由县送师、团管区。或由师、团管区到各县去接。层层机关，接到壮丁，都居为奇货卖放顶替，大发其财。卖放或逃亡的缺额多了，便又随时随地胡

乱拉人补充。这样层层辗转递送，层层舞弊，又层层互相勾结、层层互相包庇，纵有人控告，甚至也难以查出一个“水落石出”来。兵役部的一任督察官，曾检查过某师管区补充团所接收某县区的新兵名册，并集合新兵点名，竟发现有半数以上的新兵，不是某县区原籍的壮丁！这位督察向该补充团长提出责问，这位团长说：全团所接收的新兵，都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新兵的名籍一一相符，那只有把全团新兵解散，另行征召；但是再征召来的新兵，还依然是这样！听了这位督察官的报告后，也只有摇头，徒呼奈何而已！

至于说到壮丁和新兵的生活，自从他们被征集后，正确一点说，是不幸被捉后，便算落入了魔爪控制之下。首先是在层层辗转送接途中，被绳网索绑，由带枪的兵丁前后左右监押着，如同解送囚犯一样。殴打辱骂，更是家常便饭。有的接送兵人员，更是生财有道，于往返途中，办货物，做生意，这些壮丁和新兵，便成了他们的义务脚夫。负荷着沉重的货物，走的慢了，还要挨打挨骂。

由于送兵人员的克扣贪污，新兵在长途跋涉中，吃不饱，穿不暖，又无医药，都受着饥寒和疾病的折磨。患病的新兵，轻的是在鞭策之下，被迫跟着踉跄行进；重的常常便被遗弃在路途之中，更有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接送兵人员，竟把未断绝呼吸的重病号，挖坑活埋，以免累赘。江津县就曾有过路的接兵部队，把七个病兵，活埋在城根之下。尸体被群众从土里扒了出来，激起了人民的公愤，包围了县政府，要求县长扣押这一队新兵的带队军官。兵役部接到了江津县的报告，当派军法处长徐业道，驰赴江津，并命令他将该营的直接责任者，先行就地枪决！我把这个事件报告了蒋介石，并主张惩办该营主官（忘记了部队番号和部队主官姓名）。这个报告，竟似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后来才知道，这个接兵部队的主官是“穿黄马褂的”，所以才“留中不发”了！

新兵入营之后，补充团队的军官们，为了防止新兵们的逃亡，

入夜后，有的把新兵住室的门窗锁起来，要新兵们大小便都在屋里，有的把新兵们一连串地拴系起来，一人去大小便，一串人都得奉陪上厕所；有的在新兵睡下后，把裤子统统收去。真算得花样百出，无奇不有。

总而言之，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役政，其罪恶是“罄竹难书”的。劳动人民的子弟一旦被捉去当壮丁，便意味着走向死亡的道路和这一家庭的破灭。因此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淫威之下，为了逃脱这一灾难，小康之家，还可以倾其所有贿赂区乡、保、甲人员或是雇人顶替；至于那些穷苦人家，除了逃亡他乡之外，竟不惜自残肢体，有人用一种毒草把右眼熏瞎（不能射击瞄准），有人用刀把右手食指砍断（不能扣枪机），有人以石块把腿骨砸折，以求免除兵役！

本来，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寇骑深入”、“寇患日深”情况之下，除了极少数的民族败类和汉奸之外，绝大数的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劳动人民，都是坚决要求抗战的，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大批大批地踊跃参军，更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在当时国民党政权所统治的区域里，人民为什么逃避兵役，其原因，绝对不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缺乏爱国思想，而是由于国民党政权下的役政，给人民带来了无限的不幸。从而使人民意识到：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虽然还打着“抗战”的金字招牌，但是它并不是在真正抗战。因此，对于国民党的役政就采取了种种方式的抗拒态度。倘如不加分析地说：征兵困难，是由于人民“怕当兵”或是“不愿意当兵”，那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掩饰罪责！

我们面对着以上诸种情况，虽目击而伤心，竟束手而无策。当时处境如此，可是始终未放弃努力。大的地方，固然到处碰壁，无何可谈；小的地方，却还多少作了一点事，特别是新兵的福利事业，如被服、饭食、住所、卫生、医疗、交通以至娱乐等，确

立了一套较完善的制度，督导执行。企图对新兵的生活状况，能有所改善。但除了兵役部所直接控制的重庆、成都、昆明、凉山几个集训营和空运指挥部，还算是做到了新兵吃得饱、穿得暖、病有医药、行有工具之外，其他大部分师管区，基本上还是依然如故的！

对于兵役部所属不法分子，我们是极为愤恨的，也曾想以严刑峻法，雷厉风行，铲除积弊。可是像这种“扬汤止沸”的办法，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岂但难有成效，抑且也遭到了各方面的阻挠，无法搞通。

在兵役部成立后不久，我们惩办过几个贪污不法的补充团长，重庆报纸上也时常登载这一些消息。于是陈诚在军政部的“纪念周”上讲话了，他说：“兵役搞好搞不好，不在办几个小猫小狗宣传宣传，显显威风。”

后来，我们接着查办过几个师管区司令，这就更触动了各实力派。

四川遂武师管区司令（忘记姓名），因为贪污舞弊，经查明撤职法办。这位司令是“穿黄马褂的”。宪兵司令张镇，曾亲自去找兵役部次长秦德纯，说×××是黄埔老同学，资格很老了，是不是该给留点面子？否则，连黄埔同学们都觉得不好看！这个司令的职务撤是撤了，案子移送到军法总监部后，还是不了了之。

广西某师管区司令（忘记了番号和姓名），虚报征兵数额，冒领征兵费和军饷。后来我们命令他拨补新兵，而他却无兵可拨。这一舞弊事件败露了，兵役部正在查办该司令的时候，李宗仁打给我一电报，对该司令，要求我“特别关照”，结果也只能将该司令撤职了事。如果一点也不予“关照”，那末得罪了这位“桂系”首脑人物，尔后在广西的役政工作，就会产生阻力。

安徽皖北师管区司令李文田，原是“西北军”旧人，经人告

发，有种种贪污不法行为，因将其电调来渝，交由军法处转呈军法总监部法办。他见到我，态度很镇定，并且说：“我的案子既已由军法机关审理，你就不要管了。”后来才知道，他向各方面送了很多厚礼，结果弄了个“证据不足”，免予法办。

正当我们查办几个师管区司令的当儿，各方面纷纷传来了反应讯号。兵役部常务次长徐思平，就好几次把主任秘书韩梅岑，请到他的办公室里说：“我和鹿部长的关系不够，不便向他进言，某某师管区司令某某，是邓晋公（邓锡侯）的人；某某师管区司令某某又是某公的旧人……请加以注意。”

从各方面也飞来了一些流言蜚语。说什么“兵役部大批地撤换师管区司令和补充团长，“西北军”大可以布置势力了。我听了这些话，说过一句笑话：“不用害怕，师管区的新兵没有枪，造不了反。”

在一次“官邸”汇报会上（蒋介石定期地招集各部部长在他的住所举行工作汇报），我报告了严惩不法人员，清除兵役积弊的事，蒋介石听了却笑了笑。当时他对程泽润那种态度，不知到那里去了。本来蒋介石要我出来做兵役部部长，也不过是利用我把兵弄来。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行，那里是要我来整顿什么役政！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我居然也妄图严惩不法人员，清除役政积弊，真是一个“笨伯”！

然而蒋介石要我做兵役部长的目的，毕竟是达到了。总计兵役部替他搜罗了一百万左右的新兵补充了他的军队，支持了他的统治。各部队新兵的征补，仍旧是依照旧兵役署的旧制度，各部队都有指定的征补区。该征补区的师管区司令，即由该部队的副军长担任，由兵役部规划自征自补办法。兵役部另外直接掌握四川省若干师管区，负责“远征军”及其他部队的兵员补充。蒋介石认为兵役部完成了任务，还曾予以嘉奖。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感愧有加了！

日寇投降、自请下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我和兵役部的几位故旧友好，考虑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的国内政治情势。大家一致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当日寇大举进攻豫、湘、桂的时候，我们出任兵役部部长，办理兵役，还可以说为了坚持抗战；虽然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但人民还是可以原谅我们的。现在抗日战争结束，我们如果继续办理兵役，又是为了谁？为了什么呢？尤其是蒋介石，今天虽然一再电邀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共商国事”，但是他究竟有几分诚意？这是没有人敢作保证的。将来如果有一天，蒋介石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又挑起了内战，难道我们还要为蒋介石征兵，去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吗？不能，我们决不能这样做！

谈到这里，大家一致主张：“以日寇业已无条件投降为理由，自请结束兵役部”。

我把大家商谈的意见告诉了冯先生。他听了之后，把大腿一拍，伸出了一个大拇指，说：“好！好！高明！高明！”

于是我写好了一份“签呈”，内容是：（一）日寇业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即将胜利结束，兵役部已无存在的必要，应请撤消，另于军政内设置兵役署，继续办理兵役事宜。（二）从现在起宣布先停止征兵一年，以示“与民休息”之意。

我带着这份“签呈”，到“官邸”见到了蒋介石，向他提出了“即行撤消兵役部”和“宣布先行停止征兵一年”的问题。他听了眉开眼笑地说：“先行停止征兵一年，可以照办”。关于兵役部撤消问题，他说：“抗战结束了，兵役还是要办呀！”我说：

“兵役虽然还要办，但是也不必再设这末大的一个兵役部。在军政部内有一个兵役署，岂不也就可以了么？”他说：“先不忙，研究研究再决定吧！”我说：“委员长！不必再研究了。在兵役

部成立之初，委员长以抗战大义相责，要我担任兵役部长，我不得不勉供驱策；今天抗战既已胜利结束，我的任务就算完毕，所以特来交令！”说着我便把那份“签呈”递给了他。蒋伸手接过这份“签呈”，说：“先放在这里！先放在这里！”

我从“官邸”回到兵役部，即嘱各部门，着手从事结束工作。

过了些时候，蒋介石邀我到“官邸”。一见面，他便说：“就依照你的意见，兵役部撤消，另在军政部内设置兵役署。关于你，今后还要另行借重。”我笑说：“关于我，不劳委员长再行费心了。抗战胜利了，也让我休息吧！”他笑说；还早！还早！兵役部结束，还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兵役部一些人员，一年来都是很辛苦的。兵役部结束后，应当发给他们一点遣散费，将来政府“还都”，不致使他们流落无归就行了！”他连声说：“好！好！你作份预算，拿来我批一下。”

兵役部即于1945年11月宣布结束。在军政部内重新设置了兵役署，仍以旧兵役署署长徐思平为署长。

我离开重庆后，为了躲避蒋介石再和我有什么纠缠，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北平和天津，很少在南京。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后，原拟将兵役署再恢复为兵役部的建制，仍想要我重作冯妇，并不断着人来征询意见，我都毫不犹疑地拒绝了。最后没有搭上贼船，真是幸何如之！